

新中国成立前民盟对政治协商制度的贡献

●王同彤

人,奠定了早期民盟“三党三派”的架构,也开辟了民盟通过协商和合作解决国是的基础路径。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民主宪政中的活跃表现,吸引了大批无党派民主人士。为取消党派限制,变政团联合体为民主人士个人联合体,1944 年 9 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议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并讨论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纲领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民主制度的具体方案,如“民主国家以人民为主人,国家之目的在谋人民公共之福利,其主权属于人民全体”“国家应实施宪政,厉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等。此次改组后,民盟有计划地在中国西南、西北等地区发展组织,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政治舞台上具有了真正意义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以“最大公约数”为其后与中共的合作与协商作好了路径和经

民盟与中共合作互信机制的建立

民盟成立后,迅速找准定位和立场,以“中间道路”的姿态,成为当时国共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力量,这既有效整合了国共而外的政治诉求和力量,同时在“民主宪政”运动、“联合政府”口号呼应等方面,在救国理念及行动上与代表先进政治方向的中共达成了同频共振。

1945 年 7 月,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以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为代表的六位国民政府参政员赴延安与中共领导人会面,双方一致同意为了民主大义迅速召开具有民主实质的政治会议,以期实现和平民主建国。同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鉴于中共的政治理念与民盟高度契合,民盟与中共进行谈判,决定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双方同意遵守以下约定:双方不得

单独与国民党妥协合作;凡中共主张,且不违背民盟原则的情况下,民盟有支持的义务;民盟在各解放区可设立支部,中共承认协助,并与中共地方支部交换情报。这表明,在抗战胜利前,通过访问延安、谈判约定等途径,民盟与中共两党逐渐靠近并相互支持,为接下来抗战胜利后在政治协商上里程碑式的合作奠定了新的道路和基础。

民盟与中共在“旧政协”里程碑式的合作

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中签订的《双十协定》,未能扼制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政治野心。重庆谈判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从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出发,团结协作,努力促成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旧政协”)的召开。“旧政协”最初商定的代表名额是:国民党 9 人、共产党 9 人、民盟 9 人、社会贤达 9 人,共 36 人。民盟与国共两党名额相等。但国民党在代表名额上一边以高官厚禄拉拢和利诱民盟部分领导人,一边又鼓励青年党在民盟内部闹独立,硬要把民盟的 9 个名额让出 5 个给青年党,对民盟进行分化,以孤立共产党。中共对此提出反对意见,最终决定让青年党单独参加政协会议,但不占民盟名额,由中共让出 2 名、国民党让出 1 名,再由总名额的 36 名增加到 38 名,维持民盟 9 个名额不变。

中共主动让出代表名额以照顾和支持同盟者的真诚态度使得民盟深受感动,增强了其对中共的信任与感情。会议期间,民盟与中共在宪法草案、国民大会、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等五方面议题上商定:各民主党派提出的宪法修正原则限制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有利于政治民主化的实现;民盟与中共双方共同的代表席位应占国民大会代表总数的 1/4,以防蒋介石将其变为自己的表决机器;为打破国民党的提案骗局,同时避免陷入僵局,可以接受国民党“扩大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建议,但必须用委员制的集体政府来

取代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总统制;民盟反对国民党的主张,支持中共的《和平建国纲领》等。

然而,国民党并未遵守政协决议。1946 年 6 月,国共两党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单方面决定于 11 月召开“国民大会”。为维护政协决议,民盟拒绝参加“国民大会”,抵制国民党的“政府改组”,此举激怒了一意独裁统治的国民党。1947 年 10 月,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行解散民盟并明令“严加取缔”民盟及其成员的所有活动。同年 11 月,民盟总部被迫在上海宣布解散,民盟不得不以其他秘密的或地下组织的形式进行民主活动和反国民党独裁斗争。但民盟在“旧政协”以及遵守政协决议上与中共紧密合作,进一步增强了双方的合作信心,也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前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最主要的成功案例。

从响应“五一口号”到确立“新政协”纲领

1948 年 1 月,在中共的帮助下,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恢复民盟总部,郑重表明了彻底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会议通过的《三中全会政治报告》全面阐述了民盟在新形势下的斗争目标和任务,明确提出“坚持站在人民的民主的这一方面”,“积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武装”,要“彻底消灭独裁卖国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标志着民盟的政治天平彻底“向左倾斜”,也标志着政治协商制度的关键要素——接受中共领导的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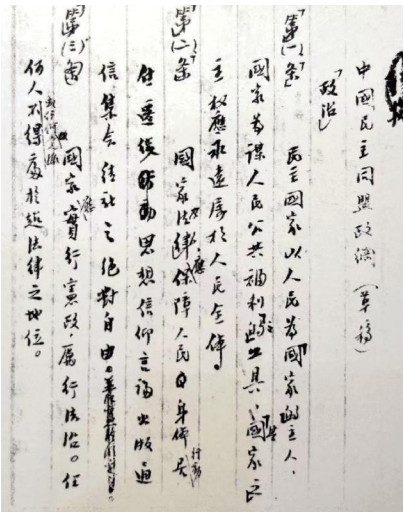
1948 年 4 月 30 日,为迎接全国解放,中共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6 月 14 日,民盟发表《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指出“五一口号”“是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今日救国建国的唯一正确途

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为本盟的一贯政治主张”。民盟还提出通过“新政协”解决国是的四点基本认识,进一步表明了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民主新中国的政治立场和主张。从这一刻起,民盟已经放弃了过去对“一纸议决安天下”的知识分子幻想,转变成成为浴火重生的成熟政党,并勇敢地担负起共同建设新中国这一时代和形势赋予的光荣使命。

1949 年 1 月,民盟连续发表《响应毛泽东主席八项和谈主张》和《对和平的态度》,积极响应与支持中共的立场和主张。3 月,民盟总部由香港迁至北平,成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并致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示“愿以至诚接受贵党领导,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并愿与贵党密切配合,尽其应尽之责”。6 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民盟中有沈钧儒、章伯钧、张澜、张东荪、周新民、罗隆基、楚图南七人参加。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与会的民盟代表共 16 位。

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致辞中指出:“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今天我站在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地位,我特别要唤起我全体盟员一致团结起来,拥护将来的新政府,以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本来是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统一阵线。将来的新政府,又是一个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联合政府。统一联合,才是真正的团结。”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民盟领导人参加了开国大典,并致贺电表示民盟“完全拥护政府,坚决执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完成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建设”。

综上所述,民盟在召开人民政协、组建新中国的历史关键点上担当了独



▲《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手稿

一无二的使命,不仅为中共建立政治协商制度提供了坚实保证,更为其他民主党派树立了信心和示范,引领它们参与到由中共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中来。这首先是因为民盟由多党多派凝聚而来,具备了丰富的政治协商经验;其次,在民盟成立之前,具备实际政治实力的只有国共两党,不存在多党合作,而民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舞台上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最后,民盟通过“旧政协”中与中共同舟共济、团结“第二条战线”、响应“五一口号”等行动,在民主党派中最先与中共建立起了合作互信机制,承担了民主党派主力军的作用。故此,民盟作为与中共合作时间最长、政治协商经验最丰富的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时期,具有民主党派中最突出的地位和作用,为人民政协成立和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作出了卓越而独特的贡献。

(作者系民盟市委青委会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重点建设办公室副主任)

纪念应云卫诞辰 120 周年

应云卫是中国著名戏剧、电影艺术家,1904 年出生于上海,1956 年加入民盟。为纪念应云卫诞辰 120 周年,本报独家刊发由应云卫孙女、民盟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委员会原副主委、复旦大学教务处原副处长应质峰撰写的纪念文章,共同缅怀这位有着深厚爱国情怀的老盟员。

怀念我的爷爷——戏剧、电影艺术家应云卫

●应质峰

我的爷爷应云卫是戏剧、电影艺术家。记得 2004 年,在爷爷诞辰 100 周年之际,家人为他出版了《应云卫纪念文集》,里面有不少他朋友的题词,其中,夏衍的“戏剧魂”三个字印在了扉页,让我印象尤为深刻。

我最近读了著名影评人石凌鹤在 1936 年 12 月写的《应云卫论》,清晰了解到爷爷早期从事戏剧、电影的足迹。爷爷于上世纪 20 年代在日商轮船公司做买办时,就利用业余时间活跃在话剧舞台上。1933 年,在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之际,他在地下党领导下导演了话剧《怒吼吧,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并彻底离开了安逸的生活。他编导的电影处女作,是党的电影小组领导的天通影业公司的首部话剧《桃李劫》,该片在 1934 年 12 月首映,是中国首部采取同步录音的方式拍摄的有声电影,其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一直传唱至今。

1937 年春,上海成立了业余实验剧团,爷爷担任理事会主席兼舞台监督,剧团演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武则天》《太平天国》等,爷爷亲自执导了曹禺的新作《原野》。七七事变爆发后,话剧《保卫卢沟桥》于同年 8 月初在上海蓬莱大戏院演出,爷爷是庞大的导演团成员之一。随后,他任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四队总队长,告别家人率队沿沪宁线作抗日救亡演出。

1938 年 1 月至 1941 年 6 月,爷爷在武汉和重庆任中国电影制片厂导演。他所导演的《八百壮士》是默片,但运用了蒙太奇的导演手法,这在中国电影中还是首次。其中一连串的叠印画面,快速的场景转移,非常简洁地展现了八百壮士宁死不屈、英勇杀敌的壮举以及上海人民对民族英雄们的支持与崇敬。影片在国内公映后,引起了国人的强烈震撼,很多爱国志士都在此片影响下投身抗战。该片在美、菲、编、法、瑞士等国的侵略大会上放映,引起了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

热情关注,不少国际友人自愿捐款支援中国抗战。今天,在四行仓库纪念馆中,观众还可以看到该片片段和我爸爸应大明对此的叙述,以及一座“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优秀影片”新进杯奖杯。

1940 年 1 月,爷爷率“西北摄影队”赴内蒙实地拍摄《塞上风云》;在同年 2 月和 9 月两次途经延安,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的亲切接见。10 月 21 日,他们返回重庆。该片历经磨难,终于在 1942 年 2 月在重庆抗建堂正式上映。

皖南事变后,一批文化人转移到香港等地。受周恩来同志的重托,爷爷放弃了在国民党控制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导演的高薪职位,于 1941 年担任“中华剧艺社”社长。剧社演出了《屈原》《天国春秋》《家》等话剧,激励了民众斗志。

爷爷曾在 1938 年《弹花》杂志上发表《战斗的戏剧》一文,其中写道:“在文盲遍地的中国,文学的宣传和理论的讲说,都不如戏剧容易被大众接受,都不及戏剧收效宏大。所以戏剧成了文化运动中锐利的武器……拿戏剧的力量和我们最大的敌人战斗。”正是用电影、戏剧作为抗战的武器,激励着、鼓舞着国人的抗战热情与决心,同时也展现了他的爱国情怀。

为了抗战戏剧事业,爷爷把孩子们托付给他的大嫂照顾。他不幸失去了一儿一女。我的叔叔在上海因贫病交加、感染肺炎而夭折。在爷爷、奶奶去塞外拍摄《塞上风云》时,他们把年幼的女儿托付给重庆老家乡,她也不幸染病而亡。我想,这也是我父亲应大明 1948 年立志选择读医科大学,毕业后选择做儿科医生,一辈子为患儿、为医学事业作贡献的原因之一吧。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拍摄了故事片《不准走那条路》,京剧《宋士杰》《周信芳舞台艺术》《武松》和越剧《追鱼》等戏剧艺术片,将

这些老艺术家们最好的作品留给了后人。1964 年北京京剧汇演时,周信芳院长邀请爷爷担任《智取威虎山》的总导演,他用话剧艺术的形式来改编传统京剧,获得了广泛赞誉。同时爷爷还为沪剧团排练《红灯记》,为话剧团导演《日出》等等。

1959 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之际,爷爷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一个话剧老兵的话》,回顾了自己在党的领导下,从上世纪 20 年代初到 50 年代末,成长为“话剧老兵”的经历。

爷爷担任过江南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市电影局顾问,中国电影家协会第一届委员和第二届、三届理事,影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务。1956 年,爷爷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近年,我从民盟市委查询到了爷爷的入盟申请书,其中详尽的履历非常珍贵。爷爷还在《上海盟讯》上发表过参加盟代会的体会《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都交给青年一代》等文章。

爷爷生前没有留下完整的著作,但这几年我从不同渠道查阅到,爷爷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超过 80 余篇,其中不少份量很重。如 1942 年 11 月 8 日,他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致苏联戏剧界的信》,只署名“应云卫”三字,我询问了文艺界老领导的后辈,他们说:“你爷爷是知名民主人士,不用说是干啥的。”

1967 年,爷爷不幸离世。1978 年 11 月,上海电影局在龙华革命公墓举行了“应云卫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会上,夏衍从北京寄来悼文,道出一个雪藏 48 年的秘密——“应云卫是左翼剧联的秘密成员!”原来在 1930 年“剧联”成立不久后,爷爷就加入了。从那时起,他就在“剧联”的领导下,为新中国成立、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一直贡献自己的力量。但从那时一直到离开人世,他都不曾和家人提及过此事。

“面对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不要被名利所困。”这是爷爷给我们大家庭留下的最大财富。

民盟盟员刘开渠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主持并参与设计创作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其中《胜利渡长江》《欢迎人民解放军》《支援前线》三块浮雕是他雕塑艺术的代表作。为纪念刘开渠诞辰 120 周年,本报特选民盟上海长宁区委青委会秘书长,上海市园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总工程师赵彦撰写的《刘开渠在上海(1946—1949)》,以追怀这位杰出的人民艺术家。

刘开渠在上海 (1946—1949)

●赵彦



▲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浮雕《胜利渡长江》

和创造的精神”。他特别强调把建筑师、雕刻师、园艺师统筹起来,“以民族精神、国家思想与时代潮流为根据的去创造,尤为全部重要的关键。至于如何才能创造新建筑、新雕刻、新的园场布置那更须分别加以研究、说明”。在工务局的安排下,刘开渠先后参与了修缮和平女神像、筹备上海美术馆、设计英士公园陈英士雕像等工作。

遗憾的是,以上刘开渠参与的高有记录在案的造园课都市美术工作大多停留在图纸设计阶段,均未能实现。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更坚定了刘开渠为梦想而努力的决心与信心。

雕塑艺术创作

在繁忙工作的同时,刘开渠还挤出时间以极大的热情为蔡元培和鲁迅这两位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老师塑像。

1947 年刘开渠受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委托,为蔡元培塑像。这并非刘开渠第一次为蔡元培塑像。刘开渠认为,为蔡先生塑像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承接这项工作正可表达他对蔡先生的崇敬和感恩之情。蔡元培胸像于 1948 年 10 月运抵北京大学孑民纪念馆,该像“红铜精刻”“安详苍老,令人景仰”。刘开渠又用蔡元培胸像所得酬金的剩余部分为鲁迅塑像。为此,刘开渠和夫人曾专程去拜访许广平。许广平对刘开渠的想法很支持,提供了很多鲁迅先生的照片。刘开渠先后为鲁迅做了一个浮雕像和一个圆雕头像。

除此之外,刘开渠还为叶恭绰、范旭东及上海历任市长创作了雕塑。为永久纪念上海交通大学老校长叶恭绰,赵祖康出资并延聘刘开渠设计制作叶校长铜像。该铜像于 1947 年上海交大 51 周年校庆时,在工程馆改名恭绰馆命名典礼上揭幕。1947 年 4 月,永利总公司及南京永利鹼厂聘请刘开渠为中国化学工业专家、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范旭东造像。经过 10 个月的精心创作,刘开渠完成立像、胸像各一尊,立像于 1948 年 4 月运往南京永利鹼厂安放,胸像是否送往总公司待考。

参加革命斗争

早在 1946 年 3 月 24 日,为对抗国民党组织的上海美术会,西南各地复员的美术工作者和沦陷区不肯附逆的艺术家们抢先一天成立作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上海美术作家协会,站在了争取民主自由的统一战线时代潮头。刘开渠入沪工作后不久便被推举为该协会的负责人。1946—1948 年,上海美术作家协会连续三年在大新公司四楼画厅举办上海美术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展览,每次展品均达 200 件左右。展品除在报刊发表外,也公开出售,收入款项部分留作协会经费,其余的捐赠给救济苦难民众的慈善机构。1947 年,刘开渠送展的作品是《孙中山像》。

1949 年 3 月,中共地下党员陈白尘来到刘开渠家,告诉他上海快要解放了,希望大家准备欢迎解放军进城。随后,刘开渠